

简评凯里调和经济 利益的理论体系

颜 鹏 飞

凯里(1793—1879年)是十九世纪中叶早期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主要代表作是《社会科学原理》(写于1857至1860年间)。当时是经济利益调和论甚嚣尘上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放其出笼的历史背景是,阶级斗争日益采取公开的威胁的形态,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广泛传播。这股反动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凯里外,还有英国的西尼耳、法国的巴师夏。他们攻击古典学派,其目的在于摧毁从李嘉图理论中寻找理论前提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专门评价了凯里本人及其学派的理论特征,即他们“只是想用各种博爱的词句来人为地加快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的英国式的发展。”^①本文力图辩证地全面地评述凯里的经济利益调和论,以及凯里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以期引起争鸣。

一、凯里的价值论

凯里的价值论是经济利益调和论的基础。他给价值下的定义是:“价值是我们为了获得实现我们的目的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而必须克服的反作用的尺度,即人对自然的支配的尺度。”^②他又说,“价值只不过是对于我们对于这种反作用的评价”^③还说,“价值概念与比较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着。”^④可见,凯里讲的价值就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以及人们对它的主观评价,从而否认价值所反映的客观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他从来不去考察价值的社会规定性和起源。这与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关。凯里总是把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的孤立的个人,如鲁滨逊一类虚构的人物当作考察问题的出发点。马克思说:“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斯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⑤

凯里从反映人和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出发,得出了生产要素从而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结论。不过,与萨伊理论不同的地方是,他认为商品价值决定于再生产费用。这种再生产费用包括工资和利润。在他看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的价值在再生产费用中占有的份额日趋缩小,而劳动的价值日益增大。他举了鲁滨逊用弓射鸟的例子,鲁滨逊原有工具的价值随着再生产它们所花费的代价减少而一步步地减少。起初,他费很大的力气才得到他自己的弓上所用的弦;而现在,正是这个弓,使它有可能杀死为他提供弓弦的鸟和兔,这样一来弓本身便成为它自己价值减少的原因。其余一切东西也发生同样的变化,而同时,人创造的价值却在不断地提高。凯里指出:“一切生产方法上的改良都有一种趋势,要增加劳动的能力和减少

再生产同样东西所必需的费用量。……而每一个这样的变化都只是新的和较大的变化的准备，结果是现有的商品或已经积累起来的机器的劳动价值。有日益减少的趋势。”⑥

二、凯里的分配论

凯里的分配论是建立在他的再生产费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由于再生产费用是工资和利润的总和，利润是资本创造的收入，工资是劳动创造的收入，因此，在凯里看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价值的下降和劳动价值的上升，实际上就是利润的降低和工资的提高。这样，凯里就制造出所谓的分配规律：工人在社会产品中所得的份额，在相对比例和绝对数量上都得到增加，资本家所得份额在绝对量上增加，但相对量减少。凯里还杜撰了一些数字加以论证。他最终的结论是：“这就是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伟大规律。这个规律可以说是一切科学书籍中所记载的最美妙的规律，因为由它而建立了人类各阶级之间一个真实利益的完满的调和。”⑦

凯里的分配理论不仅论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经济利益的和谐一致，而且通过地租理论来论证地主、资本家及农业工人利益的一致性。凯里认为地主的土地是资本，地租则是对地主及其祖先过去投放于出租土地上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因而是利润的一种形式。凯里以此证明地主和资本家收入的质的同一性。他还给地租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即“以地租的形式取得的金额是所花费劳动的价值的利息，扣除（付租土地的）生产力和较新的土地的生产力之间的差额，而后一种生产力是在使用和投入与已耕种土地同等数量的劳动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的。”⑧这个定义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然而，他从再生产费用价值论出发，认为地主的资本即土地的价值，随着生产率的发展而下降。因此地主的分配额即地租的绝对量增加而相对量却减少，农业工人分配额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同时增加。他的结论是，地主和农业工人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因为他们都从支配自然界能力的增长中得到好处。

凯里竭力攻击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因为后者揭示了地租与利润、工资之间的不和谐和相互对立的关系。他说：“李嘉图的理论是普遍仇恨的理论……整个体系具有挑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仇恨的倾向……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⑨凯里在什么是地租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与李嘉图相一致的，争论仅仅在于地租是怎样产生或由于什么产生的。凯里并不同意李嘉图关于地主地租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的结论，进而认定李嘉图的这个结论是以下述错误的假定为基础：即地租的产生及地租量的变化，与人们先种优等地后种劣种地的耕种顺序有关。凯里认真地考察了北美土地耕作的实际状况，提出关于先劣等地后优等地的耕种顺序的独立见解。凯里对于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批判是片面的，混乱的，马克思指出：“凯里的唯一功绩是，他同样片面地主张从较坏的土地向较好的土地转移，李嘉图则与此相反，而实际上肥沃程度不同的各种土地是同时被耕种的……至于说到耕作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有时——根据各种不同情况——是同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有时是一个时期这个方向占优势，一个时期那个方向占优势。”⑩

凯里承认保存奴隶制的必要性。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与对奴隶制的辩护交织在一起的状况，是当时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美国经济发展状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奴隶主经济同步发展——的理论反映。凯里还进一步证明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他在《工资率》一书中指出：奴隶的状况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会日趋改善。

这无疑是一种虚假的许诺和安慰。

三、凯里的人口论

凯里的人口理论是经济利益调和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人类经济的发展和各阶级利益的和谐，不会被人口过快的增加所破坏，因此他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强硬的反对者。他说：“马尔萨斯学说力图将责任从强者和富者身上推到穷人身上，即推到弱者和没有文化的人的身上。”^①在他看来，上帝赋予的自然法则会克服人口增加超过食物供给的趋势。他承认人口增长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但是，他同时认为，人类控制土地及自然界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了，体力劳动逐渐因机器的使用而减少，人们的食物消费量也相应减少；食品结构的变化（以植物界及矿物界的产物来取代动物性食品的趋向增加）开放了食品供给的新来源；文明（包括文化、道德）及其赖以产生的人类神经系统的发展，促使生殖力下降，即生殖力与文化水平及智力的发展成反比，这样人类的食物需求呈下降趋势。凯里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人口增加所造成的食物需求不会对食品的供给造成压力。他说：“文化发展到自然力替代人力之时，芸芸众生的生命必不受艰苦劳作的折磨——结果体力减弱而降低生殖力，或精力从体力移注于脑力而减低了生育的比率。无论状况如何变化，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我们所趋向的变化是属于后者。我们的社会状况的改良，系起因于扩充智力活动及刺激神经系统的改进。社会愈趋向自然的形式，脑力与体力在生产维持生命的物品之中，愈相调合一这些调合在恰好的比例上使生殖力下降，而使维持人生之力增加。情况既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一个自动调节的定律，在说明过去的事实时，预示将来的情形，而使我们能够有远见卓识，节节前进，以达到最后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利益与我们对于创造这些定律的至灵、至正、至善的上帝的观念，完全和谐。”^②无疑，凯里是从上帝制定的和谐规律出发，以其错误的人口理论来反对错误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

凯里竭力反对以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他甚至说，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社会科学是“以算术为基础的、绝望的，毁灭一切的科学。”^③这种攻击是出于维护其经济利益调和论的需要，同时也表明，他对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封建生产方式而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美国资产阶级制度充满了信心。这个制度目前暂时的特征是，它的生产力正以空前规模自由发展、阶级对立还未公开化。马克思对凯里理论的本质以及凯里学派同英国经济学家的这场论战，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还很不成熟，没有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显而易见和一目了然的地步，关于这一点，北美唯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查·亨利·凯里（费拉得尔菲亚人）提供了十分出色的证明。他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代表者和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敌人的军火库。他不仅指责李嘉图，而且还指责马尔萨斯、穆勒、托伦斯、威克菲尔德、麦克库洛赫、西尼耳、惠特利、理·琼斯等等，一句话，指责欧洲的经济权威，说他们分裂社会和制造内战，因为他们证明了：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中间引起一起必然的、不断发展的对立。他拼命驳斥他们，虽然他不象愚蠢的海因岑那样把阶级的存在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但是，他想证明，经济条件——地租（地产）、利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斗争和对立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实际上，他只是证明：美国‘不成熟’的社会关系在他看来是‘正常的关系’”。^④

凯里的经济利益调和论和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两个是从完全不

同的国情出发，但是却产生了同样的意向：他们都反对古典经济学以及从中汲取思想养料的空想社会主义。稍有不同的是：凯里的主要对立面是李嘉图，巴师夏的主要对立面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巴斯夏所提供的不过是一堆注重形式逻辑的冗长的矫揉造作的陈词滥调，凯里对待特殊的经济问题如地租、信贷等进行了独立的真诚的研究。因此，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凯里实际上是美国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所以具有很大的意义，是因为他的著作从材料上说到处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最自由的、最广阔的现实为基础的，他以抽象的形式表达了庞大的美国〔经济〕关系，而且是在同旧大陆的对比中来表述的。

四、凯里的保护主义思想

凯里在早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自由主义者，而在后期却将经济利益调和论同主张保护关税等政策的保护主义相结合。

凯里觉察到经济利益调和或和谐的规律在整个世界上表现为不和谐，甚至波及到美国自身，他把作为世界市场的统治力量的英国视为普遍和谐的破坏因素。凯里认为经济利益的调和或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及各行各业的合作之上的。因此，他说：社会科学是一门“研究关于人尽其力而求其最高人格以及发挥其同群协作的最大能力的法则的科学”^⑤。英国在它本国内瓦解了这种基本和谐，进而又通过自由贸易即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到处都破坏了这种基本和谐。因此他主张美国只有在本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扶持幼稚的工商业，以此来抵制以及最终摧毁英国大工业的破坏力量。凯里在这里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经济利益调和论的破产，因为最初表现为经济和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最终表现为世界市场形式上的不和谐。从而真实地反映了英美两大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矛盾和对立。

凯里还进一步把经济关系和谐遭致破坏的原因归咎于“贸易”。他区分了“商业”和“贸易”，前者是出于人们迫切需要的联合或协作的必要，适合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较近的国内市场，后者则是为他人而执行交换的行为，大多适合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较远的国外市场。在他看来，贸易业越发达，关系一国是否强盛的工商业就愈衰弱；贸易者获利越丰，生产者和消费者就愈贫弱。凯里的实际结论是贸易不是一国财富的重要来源，而是破坏和谐的渊藪。凯里的上述解释实际上是其经济利益调和论的自我否定。马克思指出：“美国最近十八年的发展给他的和谐论以沉重打击，以致他把他始终坚持的‘自然’‘和谐’遭到歪曲的原因，不是看作由于国家的外部影响，而是看作由于贸易！结果是令人吃惊的，交换价值被当作和谐生产的基础来加以赞美，然后又说它被发达的交换形式即贸易依照交换价值的内在规律而消灭了！凯里正是用这种绝望的形式说出以下这个迟延的判断：和谐的发展就是不和谐。”^⑥

凯里力图将保护关税政策与经济利益调和论相结合，也就是把国家当成经济和谐的守护神和最后的避难所。他列举了美国资产阶级国家实行保护关税的措施和益处，如设立国内市场，以促进距离较近的生产者及消费者之间的联合，并且能减少运输成本以及缩小交换的组织；限制一国原料尤其是农产品出口，否则就会象爱尔兰那样，出现土地肥力枯竭，人口输出，国家衰弱的恶果；不仅仅在制造业，而且在采掘业、农业等部门，也应广泛推行高额关税政策，否则会引起工业的集中化，从而导致大资本的专制，等等。凯里的保护关税思想与长期居住在美国的李斯特的影响分不开，所不同的是，李斯特把保护关税视为扶植民族工业的权宜之计，而凯里则认为这是一项长久之策。凯里的保护主义是对经济利益调和论的修补，这一思想迎合了美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在与英国竞争的不利条件下，力图发展民族资本的愿望

和要求。

五、凯里及其学派在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

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德国一样，没有经历过古典的发展阶段。它从一开始基本上以输入英法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为主，并力图把它和美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凯里以前，出现过本吉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亚历山大·哈米尔登(1757—1804年)、丹尼尔·雷孟德(1786—1847年)等人，而凯里，则是建立较有影响较完整的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第一个人。以他为代表所组成的凯里学派形成了早期的美国学派，因而凯里在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富兰克林是美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最早代表之一，并且是十八世纪独立运动时期杰出的政治家、物理学家。他在《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1729年)中指出：“银的价值可以和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一样完美地用劳动来衡量。”^⑦又说：“既然贸易整个说来不过是劳动对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东西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⑧富兰克林可以说是在美国“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分析”的经济学家。^⑨但是，富兰克林在这里讲的劳动并非社会必要劳动，而是指具体劳动。他只是出于一定的实际需要而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个别问题，因此富兰克林的著作，对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并未产生重大的影响。

哈米尔登对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这位美国独立运动时期的反动政治家在1791年所作的报告《工业的奖励和保护》中，提出了工业保护制度的纲领。他反对重农主义，提倡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其主要措施是：(一)扩大分工、(二)推广机器的使用、(三)招收女工、童工及其他、(四)鼓励移民、(五)人尽其才、(六)取消对企业的限制、(七)为土地剩余产品寻找出路等等。

雷孟德是第一位企图建立富兰克林和哈米尔登都没有建立的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人。这位经济学家兼律师写的《政治经济学要义》(1823年)，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本正式探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他极力反对古典学派的世界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提倡保护主义，他尽力讴歌美国经济的发展。在他看来，美国经济具有特殊性，因而是研究和实践政治经济学规律的最好场所。这一论点为后来的许多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采纳。

埃弗雷特(A·H·Everett, 1792—1847年)，著有《人口新论》，他视人口为一国富足之源，并且提倡保护关税政策。菲利普斯(W·Phillips, 1784—1873年)著有《政治经济学纲要》(1828年)和《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1850年)，其经济思想与埃弗雷特大体相似。

凯里吸收了他以前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某些经济思想，如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反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提倡保护关税政策；注重研究美国现实经济情况，用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既讴歌资本主义制度，也为奴隶主经济辩护，等等。凯里在这样的基础上，构筑了他的经济利益调和的理论体系，并与他的拥护者组成了早期的美国学派即凯里学派。其中有史密斯(P·Smith)，著有《政治经济学概要》(1853年)；鲍恩(F·Bowen)，著有《美国政治经济学》(1870年)；鲁道夫(C·Nordhoff)，著有《少年美国的政治学》；格里利(H·Greeley)，著有《政治经济学发凡·论述保护国内工业政策是有助于劳工的全国协作制度》(1870年)；柯尔维尔(S·Colwell)，著有《美国贸易与工业生产的关系》(1850年)，《商业财政》(1858年)和《劳工与贸易》(1861年)；老威廉(W·Elder)，著有《政治经济学会话》(1882年)；汤普森

(R·E·Thompson)著有《社会科学与国民经济学》(1875年),《政治经济学要义》(1882年)和《国内工业保护论》(1886年),等。

注释:

① 马克思:《关于凯里》。载自《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2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③④⑦⑧⑨⑪⑬⑮ 《社会科学教本》第六章,第一至三节;第三十四章,第三节;第三十五章,第八节;第四十一章,第四节,第615页;第一章,第47页。

⑤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页;下册,第480页。

⑥⑫ 《社会科学原理》(英文),第四章,第三节;第148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87页。

⑭ 《资本论书信集》第66、67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⑰⑱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6、46、46—47页。

(上接30页)

在第一层次的诸因素中,政治因素在我国是改变农民生育意愿的强大力量,国家的领导、宣传教育及在生育上的决策,是抑制农民的多生生育意愿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的重要原因,今后还要继续发挥政治干预的作用。经济因素在目前农村生产力有所发展,农民的经济生活稍为宽裕的条件下,尚是一个刺激农民多育的因素,还不足以促使农民从多育转向只生一个孩子,从刺激转为抑制,经济是最终转变农民生育意愿的物质基础,目前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要用其他一切手段限制目前农村经济刺激农民想多生的一面,又要充分发挥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促使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作用。文化因素是影响农民生育意愿的强大因素,目前农村还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情况下,不容易使农民的生育意愿转向少育,应当加速推行对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提高青少年一代的文化水平,防止农民出于家庭经济的需要放松子女的文化教育,产生新一代的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对于转变农民的生育意愿,降低生育率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社会因素包括范围很广很复杂,比如婚姻家庭方式、社会风俗习惯,宗教迷信,伦理道德、民族心理等,这些方面多半受旧社会遗留下来旧思想、旧习俗、旧道德的影响,而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思想、新习俗、新道德、新的婚姻方式、新的精神文明还未完全树立,在这新旧社会因素的矛盾中,农村的生育意愿还不能摆脱旧社会的种种思想束缚,农村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人多势大多半成为人们追求多育的行为规范,像这些社会因素在近期内仍有刺激多育的趋势,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开展计划生育宣传,解决农民养老等后顾之忧,是转变农民生育意愿的重要条件。

在第三层次的中间变量诸因素中,由于各个因素的明显抑制作用,使农民多生育的意愿不能如愿以偿,对于我国的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今后要进一步推行晚婚晚育政策,完善避孕节育技术,坚持行之有效的措施,充分发挥中间因素抑制生育的作用。